

「人文香港」的「超外交」角色

洪濟田

二百年來西方走進中國、中國走向世界，香港是一個關鍵因素，但其正面和反面作用都被有意無意忽略。香港的「外交角色」是一例。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由天朝掉落污渠的惶恐、淒慘、恥辱和災難。二千年來，除了佛教東來，從來沒有一種更強、更高、更優越的外來文化衝擊和淹沒中國。西方文化以多國的軍政經力量排山倒海而來，造成千年未有的創傷，迫使中國人第一次全面、徹底、深刻、痛苦地反省生活和生存的本體性(ontology)和「中國性」(Chineseness)。

割讓香港予英國掀開滿清帝國屈辱史的第一頁，之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體中國人一代又一代傳承這一屈辱。香港是中國外交之痛，中西方關係遺留的孽種。可百年香港也有另一種歷史本質和身份。中國怎樣走向世界，一個指標是能不能看到另一面的「真香港」。在中西文化的邊緣化外，香港從漁村到國際都會，接駁中國與世界，能中國所不能，成為「邊緣化外者」(outlier)。香港人面對和處理了不少千百年農耕文明在西方工商文明排山倒海壓力下的問題；按西方坐標和現代人文標準，改造了不少「中國性」的痼疾頑症。

然而，香港本身百多年從來沒有被認為有任何外交作用，遑論發言權或外交角色。從外交上談香港，從來是負面論述，沒有正面論述香港在外交起主動作用、是產生影響的行動者和參與者(actor/player)。自從「九七」前途問題出現，到香港回歸和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三十年來全世界媒界、知識界和學術界對香港的報導和研究，鋪天蓋地。「九七」回歸後，香港內部管治和社會運作的系統性問題不斷，本地媒界、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報導和研究，汗牛充棟，但迄今似乎沒有一篇正面探討香港的外交角色和其所起的作用。

如果今天中國人換一個正面論述的視角，從更高、更闊、更遠的人類場域看香港，整個景象可以完全不同。這包括：

- (1) 香港是中西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支點、平台和坐標；
- (2) 香港是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五千年存在本體性與「中國性」轉型的支點、平台和坐標；

「九七」回歸後，香港內部管治和社會運作的系統性問題不斷，本地媒界、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報導和研究，汗牛充棟，但迄今似乎沒有一篇正面探討香港的外交角色和其所起的作用。

(3) 香港無意間造就了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新的存在本體性和「中國性」。

簡言之，香港在中國外交的角色，已超越「外交角色」，成為「人文角色」。

香港的「外交角色」和「超外交角色」，第一在於香港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支點和平台，第二在於香港是中國走向西方、西方進入中國的坐標和路標。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中，邊緣化外的「香港平台」讓中西方及世界各地「次貨雜質」匯聚，互相自由競爭、交配和淘汰，百多年從無到有，造就了一個世界「大都會」，一個有效運作、管治及自治的類現代「社會」，一個「香港人」文化身份。

一 中西交流和中國「胎外孕」的新都會、新社會、新群族

談「香港」，一般都視之為一個世界大都會，一個遠遠跟在紐約和倫敦後面的金融中心。其實，「香港」還是一個結合中西矛盾的類現代社會和文化，以及一個新生的「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香港」大都會、「香港」社會及文化和「香港人」，三者合起來是一個「胎外孕」的「香港」。

鴉片戰爭開埠百多年來，到三四十年前，香港只是英佔地、自由港、貿易場、洋場十里、中介點、中轉站。這個新社會、新群族和新都會一開埠打下基本硬件和軟件的基礎，但沒有發展成為由內外獨特性構成的完整性、實體性的「香港」，也沒有構成三十年來本土意義的「香港人」。一批批中國人和外國人來香港，都是過客；即便自由港、貿易場、中轉站變成了大都會，這裏的人仍是「僑居」、「旅港」，沒有久居的意思，不屬於「香港」，更不擁有「香港」，沒有自覺的「香港」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香港」完成「胎外孕」，開始文明的難產。

香港開埠近一百七十年，其歷史大致可以粗略分成三個階段。首二三十年是世界市集式的交易場，之後一百年漸成一個用東西方百年計差異搭建的有序社會，最後四十年生發「香港人」意識和身份認同。而最高潮是中英談判和《基本法》草擬期間，一方面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一方面幾十萬人千方百計移民外逃。不論「留」或「溜」者，都突然感覺到「港人」身份。

歷史上很少地方像香港百多年這麼久也沒有形成本土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也很少地方像香港二三十年這麼快促成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

香港是外交的產品，也是世界外交的行動者和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全方位、立體參與者，在中西間和世界舞台上（主要是被動）扮演吃重的角色。中國的現代外交由鴉片戰爭及香港殖民地自由港開始。通過香港，百多年來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走向世界；世界在香港認識、檢驗和轉化中國，中國在香港認識、檢驗和轉化世界。

然而，百年香港的政經、社會及文化模式及其在中西千百年計的深淺、虛實多層次現象，都是「有實無名」。香港的外交角色更見「有實無名」。

談「香港」，一般都視之為一個世界大都會，一個遠遠跟在紐約和倫敦後面的金融中心。其實「香港」還是一個結合中西矛盾的類現代社會和文化，以及一個新生的「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

二 香港向世界示範「中國人」的可能

在全球化下，國與國、人與人如同共處於一個海洋。外交是國與國之間知識和意識、資源和利益、權力和文化身份認同的對流、互撼和重構，可以分為以下九種有機關聯的定義和層面：

- (1) 憲政實體主權(領土、文化身份、原則、政權、軍事、貨幣、關稅)；
- (2) 國與國為單位的生存資源、經濟商業貿易金融及體育關係；
- (3) 民間私人為單位的資源、經濟商業貿易金融關係；
- (4) 民間個人之間的教育、旅遊及體育活動及接觸；
- (5) 宗教、思想、社會制度、政經體制及組織模式、意識和價值觀的交流及傳播、衝突及融會；
- (6) 科學和科技、知識、醫療的交流及傳播、衝突及融會；
- (7) 非政府體制及組織之間的非經濟活動及接觸；
- (8) 新聞和資訊、文化藝術、普及文化及娛樂產品的交流，國民對國民及國家、文化、歷史及黨政官員的觀感和印象；
- (9) 超國家的體制及組織、意識和價值觀的衝突、融會及形成。

香港一直被定性為「商業城市」、「經濟城市」。英人建成自由港，使之成為英國世界網絡的一個樞紐，也無意間成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第一個、唯一一個「便商」城市。

這九層面之間可分又不可分，互相牽動。第一層的憲政實體主權由執政者專權專職專責，以致壟斷裁處，但非絕對和無條件，其緣由、功能、合理性、正當性都必須要一個充足說法，分別在於滿足了多少人，為甚麼有關階層接受。

當權執政者的專權專職專責都受到制約，分別在於形式、節奏和效益。這層面的外交和內政、時代、社會及歷史緊密相連，受其他八層面的外交影響和決定。其他八層面的外交怎樣影響和決定第一層面，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的性質和類型，以及執政者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內外正當性和國際地位。

現在世界的趨勢是，有形無形的民間政經商及人文交往，量、質及力都愈來愈重要，影響憲政實體主權，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國與國的外交變成官與官、國民與國民、國民與本國及外國官「多點對多點」的縱橫交錯關係。

在憲政實體主權層面，香港沒有直接、正式的外交角色，但在第一層的貨幣、關稅和第二層的國際經濟商業貿易金融關係上，香港在「九七」前已具獨立身份；此外，在其他七層面，香港都作為一個外交平台和角色。在憲政主權外交之外的商貿文化體育和民間個人及集體的外交，活躍百年，死角變活池，但被貶為「買辦外交」。

香港一直被定性為「商業城市」、「經濟城市」。英人建成自由港，使之成為英國世界網絡的一個樞紐，也無意間成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第一個、唯一一個「便商」(pro-business)城市；商人成為社會中堅，享受法治、商機、效率和廉政。以商業交易為主軸，香港百多年在中國「胎外」產生一個世界「大都會」，一個有效運作、管治及自治的類現代「社會」，一個「香港人」文化身份。

香港奉行「拿來主義」，以自由主義和法治任由古今中外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雜交和競爭，直接接受現實的檢驗和篩選，形成一個有序回應現實的運作系統。香港以本身的方式處理中國的千年變局，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讓「中國人」做聯合國定義的「人」，在這個自主自由的「個體」的基礎上建構新的集體，形成一個類現代的「正常」社會和文化，立於世界之林。

社會管治、社會轉型和社會流動是中國幾千年的老大難。香港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成效，向世界示範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可能」，並且在日常事務和歷史大是大非上以之為標準檢驗和衡量中國內地／大陸及台灣。百多年來，香港的商貿文化體育和民間個人及集體的「人文外交」，反作用於中國的「憲政主權外交」，1949年後更為顯著。

三 香港以個體的「人」為基礎的「人文外交」

從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角度看，香港的「人文外交」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中成為一個知識和資訊的自由港，各種新生思潮和價值自由出入口，在香港發展和傳入內地。

1949年後，中國內地的黨政單元單一制要超越全世界、全人類，毛澤東要在有生之年畢其功於一役。內地地裂山崩、狂風暴雨式地「破舊立新」，十億人競相奔向一個方向。起初是三十年政治掛帥，投入冷戰大浪；之後是三十年經濟掛帥，投入全球財經大潮。香港則較個體化，相對自由散漫、多元開放，新舊交替相對平和，犯錯少和小，也較早可知，代價較低。

內地和香港呈現兩種對事物的態度、管治和政治方式，以至世界觀、價值觀、意願和知識大相逕庭。

香港百年來成為虛擬磨心，是中外外交和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實質平台。世界從香港觀察和檢驗中國，中國從香港觀察和檢驗世界。六十年來，中國跟香港的路向，中國就走對路，反就錯。香港建基於個體「人」的角色的自由秩序，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不單是狹義的外交。香港的「人文外交」的角色及內容包括以下十一種層面：

- (1) 西方走入中國，從香港觀察和檢驗中國；
- (2) 中國走向西方及世界，從香港觀察和檢驗世界；
- (3) 外交棋盤的香港一角；
- (4) 中國通過香港感應與認識外面世界和現代性是甚麼和怎樣的，怎樣面對自佛教東來以來的更大異質性文化；
- (5) 東方、中國和西方、外面世界通過香港互相感應、認識和現代性的異同和差距；怎樣面對、認識和溝通、學習外來、異質性，判斷優劣和取捨；
- (6) 民間私人的經濟商業貿易金融、教育、旅遊及體育活動及接觸，新聞、

從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角度看，香港的「人文外交」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中成為一個知識和資訊的自由港，各種新生思潮和價值自由出入口，在香港發展和傳入內地。

- 文化藝術和資訊、普及文化及娛樂產品的全球流通，港人對各國國民、國家、文化、歷史及黨政官員的觀感和印象；
- (7) 非政府體制及組織之間的活動及接觸；
- (8) 香港直接參與國際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組織[WHO]、奧運等)；
- (9) 中西方宗教、思想、政治文化、意識和價值觀的交流及傳播、衝突及融會；
- (10) 香港發揮本身的特色優勢，貢獻世界(自由貿易全球化和全球經濟自由化，GATT、WTO、WHO等)；
- (11) 建構、組織和操作一個(類)現代社會，在全球化、資訊化時代，和世界和平共處。

毛澤東和周恩來1949年不收回香港，主要從第一、二和三層的國際意識形態、政治和軍事的戰略需要出發，沒有從第四至十一層加以考慮。

1949至1989年四十年間，香港以其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開放、自由、多元宗教、思想、社會制度、政經體制及組織模式、意識和價值觀、新聞和資訊、文化藝術、普及文化及娛樂產品(例如電影、流行曲及電視劇)，形成一個以香港為中心、連接大陸的「海外中華」，向世界呈現一個虛擬的「中國」、一種不同於內地／大陸和台灣的「中國人」和將來可能的「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影響各國民眾對中國、中國人的社會和文化、歷史和現狀的觀感和印象。

1970至80年代之交，鄧小平主導對外收回香港和對內開放改革，兩大前所未有的難題齊來，原本是兩者矛盾互斥，只能二選一，不能雙全，他卻近乎福至心靈，唯意志闖關，把矛盾強力統一，設立一國兩制的兩個行政特區和內地四個經濟特區，吸納香港和華僑的資本主義「海外中華」。他似是「錯有錯着」，以收回香港助內地開放改革、以開放改革助收回香港，互相借力強化。

三十年來香港的「九七」問題、中英談判和《基本法》草擬及回歸，是世界各國官方與民間正式和非正式外交對香港的共同焦點。鄧小平堅持第一層的憲政實體主權層面，「一國兩制」限於認知現實政治，他只是從負面、消極看香港的問題和現實，而且是純初級資本主義經濟的層面，局限於「中體西用」，沒有進入中西方千百年背景中認識香港各層面的積極意義。1989年「六四」之後，「以我為主」成為中國黨政的指導思想，於是收緊對香港的政策，壓抑香港的自治和功能。

四 中國問題的香港路？

百多年來，在中西碰撞中，香港既是碰撞點，成了磨心，又意外平靜和穩定，有序建立起中西古今新舊交替的支點、平台和坐標，避免方向大錯和在極端之間大起大伏大跌宕，相對代價低、收效大。所謂收效，不單是指有形的可

百多年來，在中西碰撞中，香港既是碰撞點，成了磨心，又意外平靜和穩定，有序建立起中西古今新舊交替的支點、平台和坐標，避免方向大錯和在極端之間大起大伏大跌宕，相對代價少、收效大。

以和現代世界接軌的工商經濟金融成就，更是可以和現代世界接軌的管治和法治、管理和行政，以至跨越和統合中西古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意願和知識。這就是百年的(類)自由「香港路」。「香港路」是「個人自由」的香港路，但只「免於中國」，局部改造虛假虛妄的道德專制權威主義。儘管未得西方真義實學，但似已夠用。

在一千平方公里之內之外，香港用外來異質(類)現代社會的知識、資源和權力的體制及文化，來衡量並質疑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中國家天下王廷及黨政單元文化與單一制政體。

滿清時，孫中山在香港體驗引入的外來異質(類)現代社會的知識、資源和權力的體制及文化，構思引入內地，建設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民國時，省港大罷工、東江縱隊和幾代左派活躍香港，抗日、顛覆蔣介石和回流建設新中國。1949年後，香港人反大躍進、反文革和支持「六四」民主運動，總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事後保持開放自由多元的討論、反思和記憶。

客觀上，香港的經歷和經驗由最基本的現代意義的「人」開始，間接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中國家天下王廷及黨政單元單一制補現代課，由下而上形成一個「正常」社會、國度、民族、文化。

香港的「人文外交」的成效，不單是外交層面的，而是內政的，直接觸發中國古文明的蘇醒和更生。就香港內部而言，香港建立一個(類)現代社會的體制和運作章法，在全球化、資訊化時代，方便個人和集體面對人類世界的未知、不確定和不可測。

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人類各民族、國家、文化的常態，自古已然，但交流、衝突和融會的雙方或多方，其實都怕得要命。蒙古和滿清入主中原，一邊亢奮挺進，一邊怕同化他者時也被他者同化。蒙古無所不用其極維持本體完整性和文化身份，一見漢人作反便拔隊北返，保住自我；滿清一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維持本體完整性和文化身份，一方面以「吸星大法」吸收中原文化，以為有別於蒙古，「走自己的路」，可以千秋萬世，結果整個民族幾乎消失。

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必然遇上這類人類社會、文化和歷史的常規，其中一些也是香港走向世界曾經歷的問題和課題。這就是香港在「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角色。

中國收回香港、香港回歸中國，是中國在香港、香港在中國接受世界和時代的客觀規律的檢驗，香港的「人文外交」的內容是香港和中國所需。二百年來，香港這人文實驗場、平台和坐標，常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中國的現代化，對時，沿着香港路和世界接軌，走向世界；錯時，多數是偏離香港路。

往下一二百年，中國內部怎樣把十三億人有序「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又同時以之為基礎建立新的集體體制、秩序和文化身份認同，向外怎樣重上世界舞台、和世界和平交流，不單是中國的課題和問題，也是世界秩序和外交的重心課題和問題。

人類從來未見過十三億人一起在二三十年內完成幾百年的經濟發展，更想也未想過十三億人一起走過三五千年的傳統長河，向現代和後現代轉型、更生

香港的經歷和經驗由最基本的現代意義的「人」開始，間接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中國家天下王廷及黨政單元單一制補現代課，由下而上形成一個「正常」社會、國度、民族、文化。

和進發，被迫改造和自我改造，登上多元世界，在地球村佔一適當席位。香港百多年幸或不幸成為這個人類奇景的先行者，無意間成為中外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支點、交易場和變壓站，無意間形成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內在轉型更生的平台、坐標和標準，往下一二百年可能仍會發揮作用。

今天的「香港」和「香港人」對中國建立現代意義的「(中國)人」，有三重意義：

- (1) 就中國古文明重生、現代化和復興而言，香港以「港化」的西方異質性融入「中國」，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身份認同」添內容，重新界定「中國性」。
- (2) 置於二三千年來的中國歷史，香港是佛家二千年前東來後的另一次注入外來、異質文化基因和「中國再造」。
- (3) 置於文字成熟後的五千年來人類歷史中，香港如巴爾幹半島，又如佛家東來時的西安，在多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中，以最低代價達成最大成就。

百多年來，香港無意間成為中外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支點、交易場和變壓站，無意間形成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內在轉型更生的平台、坐標和標準，往下一二百年可能仍會發揮作用。

這三層面的「中國問題」，也是「世界問題」，是「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內外縱橫交錯的問題，無一不隨時觸及各國各族內內外外的歷史、社會、文化的系統性交鋒和融會，過程難料。

香港百多年來為中國補歷史、社會、文化的根本之課，如神農嚐百草，以外來異質的「現代性」，處理「中國性」問題：

- (1) 甚麼是「個體自主性、實體性」的「個人」，自由自主、自作自受。
- (2) 以「個人」為基礎，形成集體群性，守法治而多元的體制，又可以不由組織主宰、支配，自發調節和有序運作。
- (3) 「管治」(governance) 與「公民」(citizenship) 的關係。
- (4) 個人與群體、公與私、自由與秩序、危機與常態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之間怎樣「長治久安」。

往下幾十年，香港與中國面臨的未處理好的「過去的議程」和新的「將來的議程」包括：

- (1) 「五四」時提出而沒時機處理的千百年中國課題，由最形而上的世界觀、意識與知識，到最實際的政經社會管治。
- (2) 蘇格蘭式啟蒙運動的哲學、理論和具體機制操作，和英國文化的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在香港各階段怎樣發揮作用，怎樣引入、形成自由機制、自由秩序和自由轉化，怎樣以最低代價處理人、事和物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對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身份認同、中國世界觀、中國靈魂有甚麼啟示和參照作用。
- (3) 當今時代不同，環保、資訊和財經金融全球化，不再如過去十八、十九世紀以國界為絕對神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alism)漸成普世價值觀和常識；人

類社會幾百年來「大國崛起」的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式國際政經軍「運動遊藝戲」(game-play) 已變了不少規則，全球變成一個公民社會，人權高於／等同主權。中國走向世界，怎樣重構「世界秩序」。

五 「香港」、「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人文鴻溝和誤區

三千年來，西方社會及文化歷經幾次大「多元質變」，中國社會及文化，三千年來歷經「一人即萬民」的幾次大「單元量變」。

香港百年的結構和運作，放棄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單元體制、中國世界觀、中國身份認同的「單元量變」，採英人的「多元質變」，創出「雜交新種」，「無我」、「忘我」跟隨世界潮流，在自由秩序、法治體制下任由各種思潮、價值觀和世界觀競爭、存歿、轉化和發展，以「個體性的自由、多元自主和集體的法治」作為「香港靈魂」的內容。

百年香港有點像十七世紀的荷蘭，很多難民、流亡者和冒險家聚攏在一個荒郊僻嶺交易，互通有無，不太計較種族、民族、宗教、道德等本質、身份和意識形態，一切「以利為重」，「求財不求氣」，商業活動自由放任，穿越千百年中西歷史，創造了一個「活己活人」的環境，發展出一個多元雜居和互動的自由秩序、都會、社會和群體。在無人設計的情況下，中西方、東西方千百年的思潮和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習俗交流、匯流和融會。

順與逆的無意間，華人 (尤其是華商) 在這裏得到千百年未有的機會和保障，成為一個「人」。他們逃離家鄉，但心繫家國，「國有道」，雖有機會連群結隊回家回國建設，但只被當工具，「內體外用」，並未被家國認真認識和肯定香港和香港人的人文內涵、價值和意義。

百年橫互在「香港」、「中國」和「世界」之間有一道人文鴻溝和誤區，今天有增無減。在十九世紀及其世紀之交，還有人正面看香港。鄭觀應、洪仁玕、康有為、梁啟超、何啟、孫中山、胡適肯定「香港實務」，開始心向、趨近「香港靈魂」。二十世紀中國大眾和知識份子 (不論保守或革命、左或右) 大部分時間視香港為罪惡深淵，是「歷史」上的國恥印記，以及「現行」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妖魔鬼怪。「香港」代表、等同「國恥」的「原罪」，由內而外、由實到虛，只能是罪惡，不可能有甚麼是好的、正面的。開放改革後期二十年的成功，使中國迅速漂離香港的實體和文化靈魂。

往下一二百年的「香港」、「中國」和「世界」會是怎樣？一大變數是這天塹能不能變通道，怎樣變。

香港採英人的「多元質變」創出「雜交新種」，「無我」、「忘我」跟隨世界潮流，在自由秩序、法治體制下任由各種思潮、價值觀和世界觀競爭、存歿、轉化和發展，以「個體性的自由、多元自主和集體的法治」作為「香港靈魂」的內容。

洪清田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及公民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學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及社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